

学习贯彻讲话精神 书写新时代新华章

把先进文化建设不断融于党的奋斗征程之中

□郭伟伟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对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总结。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党,党的百年奋斗凝结着我国文化奋进的历史。”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回顾和总结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建设先进文化的探索和成就,对于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举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旗帜,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始终发挥文化建设的感召和引领作用。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记载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选择先进文化,并沿着先进文化所指引的方向不断前进的历史轨迹。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和先进文化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先进知识分子努力创造和实践先进文化的结果。

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的同时,始终把革命文化看成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重视文化建设,鼓舞革命文艺创作。毛泽东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我们党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的思想和主张,为当时的新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促进新民主主义文化蓬勃发展。中央苏区文化运动,20世纪30年代初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化运动,抗战时期从蓬勃兴起的延安文艺运动到欣欣向荣的抗日根据地文艺运动,从不屈不挠的国统区文化运动到险恶环境下发展的“孤岛”文化救亡运动,这一切都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历史足迹。

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积极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文化建设新路,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方针和原则。比如,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繁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关于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关于建立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的思想;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和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思想;关于坚持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高到巩固社会主义政权高度的思想,等等。在其指导下,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新局面,从思想上、精神上极大地解放和激励了广大干部群众,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形成了凝聚人心、统一意志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共同理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的同时,在文化战线和知识分子政策上实现了拨乱反正,迎来了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举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旗帜,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始终发挥文化建设的感召和引领作用。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记载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选择先进文化,并沿着先进文化所指引的方向不断前进的历史轨迹。我们要把当前的先进文化建设融于生动具体的党的历史进程中,融于丰富鲜活的党的历史经验中,从我党建设先进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汲取营养,得出启示,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而不懈努力。

春天。1979年10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致祝词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党的十二大报告全面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明确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确定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阐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基本指导方针。这一时期,党在总结领导文艺工作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反映了文艺发展繁荣的基本规律。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艺术事业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新局面。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从文化的角度阐述了精神文明建设,赋予这两个概念在内涵上的统一性:“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党的十五大报告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的崭新观点,将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起来。2001年,江泽民同志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提高到国家治理和政权建设的高度,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思想。同年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他进一步把“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提出来,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内涵的丰富和深化。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根据实践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和新政策,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国家文化安全战略,“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深化了对文化工作规律性的认识,发展和丰富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文化自觉。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专

门讨论和部署文化工作,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文化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深刻指出,“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这些重要论断,意味深长,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坚持以什么思想理论为指导,是文化建设的首要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并就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方向性、战略性问题作出部署,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明确提出来,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关系我国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的重大制度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注重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根铸魂;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所有这些,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总之,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历史是积极引领和践行中国先进文化的历史,是不断建设和发展先进文化的历史。我们要把当前的先进文化建设融于生动具体的党的历史进程中,融于丰富鲜活的党的历史经验中,从我党建设先进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汲取营养,得出启示,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而不懈努力。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一种有效的写作必须既包含了传统中优秀的部分,又提供了传统所没有的新质,方能称得上真正的创作。当中的关键在于现代性转化。

长篇小说《迷城》的创作过程中,我最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历史感的重要性。

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化是文学创作永远的源头活水。我们所提倡的中国叙事、所维护的中华文脉,无法脱离对古典文学的继承和对民间文化的学习,但这种继承必须是一种创造性继承,这种学习必须是一种萃取性学习,否则我们的创作将被过去庞大的传统所覆盖,成为文学史意义上的无效写作。一种有效的写作必须既包含了传统中优秀的部分,又提供了传统所没有的新质,方能称得上真正的创作。当中的关键在于现代性转化。以《三国演义》或者《西厢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来描写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和现代人的情感,显然会导致别扭与隔膜。而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农业文明时代的自然观也不尽适用于当代的生态文学。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是植根于实践的创新,从周敦颐到王船山,从魏源到谭嗣同,这些精通传统的代表性人物从来不拘泥于传统,而是在与时代的互动中创造出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湖湘文学也必须体现这一特质,避免在故步自封中成为一种保守的文学。文学中的湖湘气质只有在有根的创新中方能得到真正的体现。民间文化同样需要在转化中加以创新,而非全盘接受。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是,民间文化既蕴藏着无穷的素材,又含有不少陈腐、低俗的观念与内容,必须加以甄别和提炼,在此过程中体现出文学应有的引导功能,这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传统的一个根本立场。

文学上的一切认知最终要通过作品来体现,通过精品来确认有没有真正抵达。我将怀着正信,心无旁骛,精思细研,不期速成,但求致远,争取为湖湘文学、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系湖南省作协副主席)

我们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作了全面深入的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对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总结。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党,党的百年奋斗凝结着我国文化奋进的历史。”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回顾和总结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建设先进文化的探索和成就,对于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有着重要意义。

自古以来,文艺就是时代的产物,它们从来离不开所产生的特定时代。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古人就关注一定时代的音乐与国势、民风的关系。吴公子季札到鲁国听演奏夔、雅、颂并一一进行评价,就是古人关于时代与文艺特定关系的早期论述。在《毛诗序》中,曾论述诗歌与时代、社会的关系,提出“治世之音”“乱世之音”“亡国之音”的不同。到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便说:“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唐代以来,文人墨客们把“文”与“道”连接在一起,说明文艺与自然规律、社会演变和人生道德的关系。比如梁肃就说:“夫大者天道,其次人文……故道德仁义,非文不明;礼乐刑政,非文不立。文之兴废,视世之治乱;文之高下,视才之厚薄。”又说,“文章之大,与政通矣”。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近现代以来,多次出现文艺与政治、时代关系的争论。鲁迅在1927年《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讽刺一些人躲入“象牙之塔”,说19世纪“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统一”。又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文学不可能超越政治,陶渊明晚年归于田园,其诗文也没有“完全超越政治”,而“于朝政还是留心”的。瞿秋白在1932年的《非政治主义》中批判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假招牌”,是“虚伪的旁观主义”。在书画界,画家石涛曾经提出“笔墨当随时代”的重要观点,一直被文艺界广泛引用。

新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哪些?首先,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中,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文艺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所依赖的地基性现实,无论谁也不能忽视它、绕开它。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在一步一步一个脚印地解决这种矛盾中不断前进。具体来说,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了重大突破,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经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2021年GDP再次突破100万亿;第一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已经实现,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始向第二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挺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国防、科技建设成效显著,我国国际地位大大提高。生态文明建设、“一带一路”建设也令世界各国所赞扬。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全面胜利,粮食产量连续多年一路上升,城乡携手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已经大大提高。特别是我国近两年的抗疫斗争,取得了令全球瞩目的系列胜利,广大人民群众切身体会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强大社会心理得到重塑。党的建设和反腐倡廉斗争步步深入,全党的领导力、执政能力进一步提高,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正在形成,不计其数的先进典型不断涌现。在城市繁荣、乡村振兴的前提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核心价值观的涵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弘扬都成效显著。

时代总在进步,我们必须认识到人民的文化需求一直在增强,审美标准也在提升。广大文艺工作者必须面向新时代、反映大时代,要共同用自己的作品去吹响时代的号角,擦亮民族精神的灯火。然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世界变得复杂多元,又因全球化、网络化而更加碎片化、透明化,从而导致文学艺术陌生感、传奇性与整体观的削弱。文艺界的浮躁不安和新出现的多种庸俗化、过度娱乐化和商业化的不良现象,以及“非英雄化”、“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倾向都对文艺的正常发展形成了干扰。这便是当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再者,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文艺的发展已经从追求作品数量转向追求作品的质量。这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大难题。

我们要牢记使命,不忘初心,谨记“国之大者”,“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我们要用自己的笔杆和歌喉发出当今时代的宏大声音,创造出大时代中人民拼搏前进的史诗。正如作家刘醒龙所说的那样:“没有哪部史诗不属于大时代、大历史。也没有哪个历史与时代,不曾追求与史诗般配的气质。”(刘醒龙《我们这个时代的情怀与史诗》)

我们要坚持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坚信“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坚持创作表演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当今现实生活的风风雨雨就属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时代性的历史就在人民的现实生活中。要通过深入体验生活而获得丰富的题材,用重大题材或小中见大地表现人民奔向新生活的喜怒哀乐,努力形成作品人物命运与读者、观众的心声共鸣,从而表现出“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展示“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进而抒写出“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全景式地展现我们伟大时代的恢宏气象。要在把握时代精神的前提下,积极挖掘和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国精神,发展中国美学,对已有的传统文化艺术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要立志用精品力作讲好中国故事,同时回报我们的衣食父母,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和对我们所寄予的殷切希望。

让我们拥抱这个新时代,深入新现实,了解 and 表现这个伟大时代。不要漠视、错过这个为社会主义文艺作贡献的大好时机,不要做冷眼旁观者,而要千帆竞发、百舸争流般地拿出与时代相匹配的艺术精品和不朽的文化经典来。

(作者系河北省文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

文艺创作要面向新时代

袁学骏



有根的创新

□马笑泉

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既是一次盛大的检阅,又是一次集中的呼唤,检阅过往的成果,呼唤未来的检阅。我是第二次参会。转眼五已过去,我再次觉出时间的宝贵,还有紧迫。身为作家,创作出真正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品力作,乃第一要务。写作者的责任、使命,还有职业道德,均首先以此来承载、来体现。此次作代会的报告中指出,目前主要的问题不是作品多不多,而是好不好。这其实是在间接陈述一个事实:作品虽多,精品却少。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文学事业的繁荣便难以真正落到实处。

如何锻造文学精品,这次大会反复强调了一个关键词——守正创新。这实际上提供了根本性的方法论。“正”是文学的基本特质:生动精确的细节、富有韵味的语言、灵动飞扬的想象、坚实合理的结构、血肉丰满的形象、对人心和社会的深刻洞察、对人民与江山的深厚感情……这是一切文学工作者必守之正。离开了这些最基本的特质,文学也就不成其为文学。所以,要守,要坚守。“新”包含了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时代所提供的新形象和新体验,等待我们去挖掘、去提炼、去塑造;二是在这个过程中,要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表现手法、新的文学语言、新的艺术形式。不守正,则根基不深;不创新,则枝叶不茂。只有守正创新,文学之树才会生生不息,在岁月轮替中保持常青之态、蓬勃之势。

每位作家都有他的创作兴奋点,这种创作兴奋点实际上是由作家最深的体验和最根本的审美追求共同决定的,而精品力作皆是在沿着创作兴奋点进行深入开掘之中产生的。所谓“打一口深井”,就是这个道理的形象表述。不能要求作家去打所有的井,那样只会导致人民群众早就观察和总结出的一种现象:满山捉麻雀,最后一只也没捉

到。每位作家若能打出一到两口深井,合起来便构成了生动宏大的中国文学。

过去的五年中,我出版了长篇小说《迷城》《放养年代》,小说集《回身集》《幼兽集》,散文集《宝庆印记》,在《当代》《十月》《人民文学》《民族文学》《诗刊》《天涯》《芙蓉》《大家》《作家》《作品》《江南》《湖南文学》《长江文艺》《湘江文艺》等刊物发表作品50余万字,有部分作品被翻译到了国外。我的创作兴奋点集中在两块:对当代生活进行透视性呈现和总体性表达;对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化所提供的丰富资源进行现代性转化。

透视性呈现要求作家拥有深刻的洞察力,否则无法在看似寻常之处发人之未发。这种洞察力包含了两个方面的要素:细致的观察能力与犀利的剖析能力,后者以前者为基础。观察能力属于感受的范畴,剖析能力属于思考的范畴,由此可知,洞察力贯通两个范畴,或者说,是来自两个范畴的要素融合产生的一种综合能力。它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能力,尤其在小说创作中,是与想象力地位相当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主要在微观层面展开,仿佛显微镜,又或者像可以深入到物体分子结构之中的仪器,使得作家能够在看似有限的生活中源源不断地挖掘出无限多的内容,透过表层呈现出深层的意蕴。而总体性表达需要一种宏观掌控的能力,它要将“无限多”的内容熔铸成一个大体量的整体,还要赋予这个整体以意义和价值。它要求作家不但要拥有丰富透彻的体验、高超的驾驭能力和充沛的文气,还须具备历史感。这种历史感在一个碎片化时代弥足珍贵,它使得作家能够在纷繁复杂、快速变化的万象中找到作品的价值定位。只有找到这种价值定位,方能将纷繁的碎片熔铸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这个有意义的整体通常是以长篇文本的形式出现的。在